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绩效研究

向玲凇¹, 邓 翔²

(1.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统计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3; 2.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 基于多维贫困概念, 采用效用分解模型, 从社会效益的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总体绩效进行了评估; 基于收入贫困概念, 从普惠性“三农”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着手, 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反贫困总体绩效显著; 普惠性的农业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对于减缓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问题均具有显著效果, 且普惠性的“三农”政策的减贫效果要优于专项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

关键词: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反贫困; 政策绩效

中图分类号: F 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19(2014)04-0065-04

一、引言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陲, 是我国集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边境山区和生态脆弱地区为一体的特殊贫困地区。从空间分布上讲,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四川省藏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以及西藏地区等 7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 110 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其空间分布呈现出与生态脆弱地区高度耦合、与民族自治地区高度耦合、与省界或边境地带高度耦合的格局。虽然在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总体落后状况有所改善, 但总体上仍然呈现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等特点,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 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探讨其有效的反贫困政策措施, 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目前, 国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 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 大多数研究文献都是伴随我国的扶贫开发进程而开展的经验研究, 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贫困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措施以及扶贫开发的绩效上。在影响贫困的因素中,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无疑是国内研究的焦点, 学者们就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状

况对贫困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区域发展不均衡、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的恶化又严重地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1-4]。扶贫绩效的研究, 重点围绕扶贫资金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展开^[5-7]。总体来看,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收入贫困概念, 重点讨论农村的收入贫困问题, 鲜有基于多维贫困概念, 系统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绩效的。鉴于此, 本文试图从“社会效益”概念出发, 通过构建社会效益分解模型, 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总体绩效进行综合评估, 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 从农民增收角度探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的增收效果, 从而系统研究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反贫困绩效问题, 为我国的反贫困事业添砖加瓦。

二、区域反贫困总体绩效评估

考虑到收入贫困概念的局限性, 为客观、全面地描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 研究其反贫困绩效, 本文借鉴福利经济学中社会总效用的概念, 从多维贫困概念的视角, 采用社会总效用这个指标来评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区域反贫困的总体绩效。

1. 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收稿日期: 2014-05-13

作者简介: 向玲凇, 女,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统计学院讲师,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邓 翔, 男,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续上表)

2007	5225	3.80	1.41	0.8834	-0.9171	-0.0337
2008	5771	3.71	1.41	1.3095	-0.6221	0.6874
2009	6499	3.74	1.45	1.6446	-0.9716	0.6730
2010	7197	3.58	1.44	2.0756	-0.5268	1.5488

3. 结果分析

通过社会总效用指数,具体考察“八七”扶贫攻坚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总体成效,发现其社会总效用指数呈现起伏上升的态势(如图1)。这表明,总体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绩效是显著的。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效用指数的波动看,由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在1995-1998年和2006-2010年期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总效用的增长尤其迅速。从其波动区间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区间:1995-2003年是第一个波动区间,2003-2010年为第二个波动区间。在第一个波动区间内,1995年到1998年,社会效用指数迅速增长,1998年达到第一个峰值0.9157,但随后迅速下滑,到2003年甚至下降到1995年的水平。在第二个波动区间内,社会效用指数经过2003年到2006年的上下波动,在2006年以后再次抬头并迅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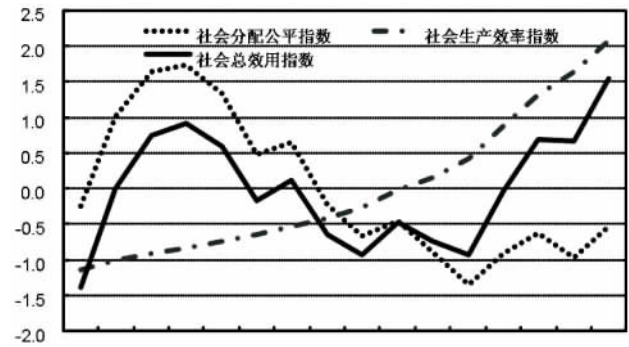


图1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效用分解图

分解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率和社会公平程度,发现其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呈现不断提高的态势,而其社会公平程度则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但近年来又显现出提高的趋势。从社会效益的分解指数看,社会效用指数的波动主要源自社会分配公平指数的波动,二者的波动周期基本一致,但当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成就主要源自其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在第一个波动区间,社会效用指数主要受社会分配公平指数的影响,而社会分配公平指数的波动又主要来源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在1995-1998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社会生产的成果流入农村的比例

考虑到社会效用包含了效率与公平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本文主要从社会生产效率和社会公平程度这两个维度着手,通过构建社会效用分解模型^[8],计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效用指数,动态地考察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反贫困整体绩效。以1994-2010年作为考察的时间区间,从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西南省(市)的《统计年鉴》(1995-2011)、《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选取了相关年份各省(市)的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就业人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城乡人口数以及东部各省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人口数等指标数据。

2. 数据处理和指数计算

为了得到实证分析所需要的变量数据,本文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1)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对各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不变价处理,并以西南5个省(市)相关年份的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GDP)除以对应的平均就业人数(N),计算得出西南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X),并通过标准化处理得到社会生产效率指数 $U(x)$;(2)为衡量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分配的公平程度,通过计算城乡收入差距比(Y_1)和城镇收入差距比(Y_2)的几何平均数,取其倒数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分配公平指数 $U(y)$,其中 Y_1 由各省(市)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人均纯收入得到, Y_2 由东部、西南地区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相除得到。(3)通过加总社会生产效率指数和社会分配公平指数得到社会效用指数 U (如表1所示)。

表1 1995-2010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效用指数

年份	X	Y_1	Y_2	社会生产效率指数	社会分配公平指数	社会总效用指数
1995	1723	3.54	1.42	-1.1437	-0.2408	-1.3845
1996	1902	3.28	1.36	-0.9987	1.0073	0.0086
1997	2086	3.12	1.35	-0.9013	1.6427	0.7415
1998	2260	3.13	1.33	-0.8269	1.7426	0.9157
1999	2429	3.23	1.34	-0.7448	1.3432	0.5984
2000	2612	3.47	1.35	-0.6457	0.4763	-0.1694
2001	2778	3.58	1.29	-0.5299	0.6488	0.1189
2002	3045	3.63	1.38	-0.4104	-0.2318	-0.6421
2003	3359	3.72	1.41	-0.2629	-0.6675	-0.9304
2004	3740	3.69	1.39	-0.0223	-0.4542	-0.4764
2005	4138	3.68	1.46	0.1532	-0.8899	-0.7367
2006	4630	3.84	1.46	0.4203	-1.3392	-0.9189

不断增大,进而社会效用迅速增长。而在1998年到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抬头,从而制约了社会效用的增长。而在2006年以后,受社会生产效率指数急速攀升的影响,社会效用指数迅速上升。

三、居民增收的政策影响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随着贫困理论的完善和反贫困实践的深化,贫困的内涵虽然不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收入贫困概念仍然是当今世界度量贫困的最为重要的概念。在中国,尤其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虽然贫困问题已不局限在农村,但农村仍然是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在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往往意味着贫困问题的缓解,因此,农民人均纯收入仍然是度量其减贫绩效的重要指标,农民增收依旧是其反贫困的主要任务。对于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综合前人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的自然分润、收入分配状况、普惠性“三农”发展政策以及政府的专项扶贫政策,是影响农村居民增收的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四个因素^[9]。其中,普惠性的“三农”发展政策和政府专项扶贫政策都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为防止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将着重从政府反贫困角度出发,选取财政惠农支出和公共扶贫专项资金两个指标,通过建立面板回归模型,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角度动态地考察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政府反贫困的政策效应。

1. 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鉴于时序数据的长度不能满足大样本估计的需求,本文选取2005-2011年四川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回归模型,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的减贫效应。其中,财政惠农支出由四川省的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度量,公共扶贫专项资金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采用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人均值度量。

从四川省《统计年鉴》(2006-2012)选取了2005-2011年四川省的财政支农支出,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公共扶贫专项资金、年末乡村人口总数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相关指标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2)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选取了2005-2011年四川省乡村人口总数数据。为了得到计量分析所需要的变量数据,笔者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1)根据2005-2011年四川省的农村人口总数和财政支农支出总额,进行人均换算得出人均财政支农支出;(2)通过加总阿坝州、甘孜州和

凉山州各贫困县的公共扶贫专项资金,再除以各贫困县的贫困村人口总数得出人均公共扶贫专项资金;(3)为消除异方差和数据的剧烈波动,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和人均公共扶贫专项资金数据的变量序列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表2 面板模型变量说明

变量	LSR	LZN	LFP
涵义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对数	人均财政支农 支出对数	人均公共扶贫专 项投资资金对数

2. 模型选择和估计

通常使用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有三种模型可以选择: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如果从时间上看,不同个体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截面上看,不同截面之间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那么就可以直接把面板数据混合在一起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参数,也即是建立混合估计模型。如果对于不同的截面或不同的时间序列,模型的截距是不同的,则可以采用在模型中加虚拟变量的方法估计回归参数,也即是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又分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刻固定效应模型和时刻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三种类型^[10]。鉴于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寻反贫困政策的增收效果,着重考察的是变量间的关系,因此可以选用混合估计模型或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估计模型来说,是否有必要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可以通过F检验来完成。

原假设 H_0 : 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相同;
备择假设 H_1 : 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不同;
F统计量:

$$F = \frac{(SSE_r - SSE_u) / (N - 1)}{SSE_u / (NT - N - k)} \tag{1}$$

其中, SSE_r , SSE_u 分别表示约束模型(混合估计模型)和非约束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N 表示截面个体数, T 表示时间序列的最大长度, k 表示解释变量的个数。

运用 Eviews 7.2 软件,分别建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支出对数(LSR)与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对数(LZN)和人均公共扶贫专项投资资金对数(LFP)的混合估计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得出 SSE_r 和 SSE_u ,进而计算出: $F = 366.63$ 。

因为 $F = 366.63 > F_{0.01}(2, 16) = 6.23$,所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相同),也即是说F检验表明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F检验结果表明,可以建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支出对数(LSR)与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对数(LZN)和人

均公共扶贫专项投资资金对数(LFP)之间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定义为:

$$y_{it} = \alpha_i + X_{it}'\beta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y_{it} 是被解释变量, α_i 是随机变量(表示第 i 个个体的截距项, 且其变化与 X_{it} 有关) X_{it} 是解释变量序列 ($k \times 1$ 阶回归变量列向量) β 为不同个体的相同的回归系数, ε_{it} 是随机误差项。

根据 2006-2011 年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面板数据, 运用 Eviews 7.2, 估计得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支出对数(LSR)与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对数(LZN)和人均公共扶贫专项投资资金对数(LFP)之间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LSR = D_i + 5.19 + 0.28 * LZN + 0.15 * LFP \\ (13.91)^{***} \quad (7.2376)^{***} \quad (1.8466)^* \quad (3) \\ R^2 = 0.92 \\ D_i = \begin{cases} -0.14 & i = 1; \\ -0.34 & i = 2; \\ 0.48 & i = 3. \end{cases} \end{aligned}$$

其中 $i=1, 2, 3$ 分别表示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

3.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建立的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支出对数(LSR)与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对数(LZN)和人均公共扶贫专项投资资金对数(LFP)之间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 3), 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和公共扶贫专项投资资金的增加都对农村居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 而且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 这种影响是显著的。也即是说, 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普惠性农业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对于减缓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问题均有显著效果。从减贫系数看, 人均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 1%,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0.28%; 人均专项扶贫投资资金每增加 1%,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0.15%。也就是说, 在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普惠性“三农”政策的减贫效果要优于专项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

四、主要结论

本文围绕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问题, 采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计数据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数据, 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减贫绩效。首先, 基于多维贫困概念, 采用效用分解模型, 从社会总效用的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总体绩效进行了评估; 接着, 基于收入贫困概念, 着重从普惠性“三农”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两个方面着

手, 建立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影响效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1) 自“八七”扶贫攻坚以来,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反贫困总体绩效显著, 社会总效用总体上呈现增长的态势, 但受社会分配水平的影响, 社会总效用的增长滞后于社会生产效率的增长; (2) 近年来,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开始逐步缩小, 社会分配公平指数开始止降回升, 但当前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保持高位, 并且与东部地区相比,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收入水平仍然很低; (3) 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普惠性的农业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对于减缓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问题均具有显著效果, 并且普惠性的“三农”政策的减贫效果要优于专项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总体上讲, 作为我国贫困分布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事业取得了巨大进展, 贫困问题在总体上得到了很大缓解。然而, 在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社会效用获得整体提升的同时, 其诸如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发展速度却滞后于其经济发展速度, 对于分散广阔的贫困人口来说, 其脱贫问题仍是当前反贫困的瓶颈。鉴于此,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未来的反贫困政策应注重医疗社会保障问题以及扶贫项目的目标瞄准问题。

参考文献:

- [1] 魏众, B·古斯塔夫森. 中国转型时期的贫困变动分析[J]. 经济研究, 1998(11): 64-68.
- [2] 陈少华, 王燕.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贫困的减少——1990-1999 年的趋势研究[J]. 财贸研究, 2001(9): 3-11.
- [3] 林柏强. 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 2003(12): 16-25.
- [4] 陈立中.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方法与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09(2): 711-726.
- [5] 朱乾宇. 政府扶贫开发资金方式与扶贫绩效的多元回归分析[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4(7): 11-15.
- [6] 林伯强. 中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政策[J]. 经济研究, 2005(1): 27-37.
- [7] 秦建军, 武拉平. 财政支农投入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J]. 财贸研究, 2011(3): 19-27.
- [8] 向玲凇, 邓翔. 中国西部反贫困动态——基于效用理论的 VEC 模型实证分析[J]. 湖南大学学报, 2012(5): 63-68.
- [9] 叶初升, 张凤华.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 SVAR 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9): 123.
- [10] 张全红, 周强. 转型时期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测量[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1).

[责任编辑: 马建平]